

巫乐华 著

中国读本



海外华侨·南洋篇



中国人移居南洋，经历了近千年的历史。这些来自文明古国的和平移民，给南洋带去了先进的技艺、勤俭的美德，并用他们的辛勤劳动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。同时，作为居住在海外的华夏子孙，他们又在与祖国荣辱与共……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中国读本
海外华侨·南洋篇

巫乐华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海外华侨·南洋篇 / 巫乐华著. —北京：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，2010.1
(中国读本)
ISBN 978-7-5078-3148-1

I. ①海… II. ①巫… III. ①华侨—历史—东南亚—通俗读物 IV. ①D634.333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230798号

海外华侨·南洋篇

著 者	巫乐华
责任编辑	张 婧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（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）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（国家广电总局内）
	邮编：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广内印刷厂
开 本	640×940 1/16
字 数	80千字
印 张	11
印 数	5000册
版 次	2010年1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0年1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148-1/D·100
定 价	18.00元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(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开 篇 中国人下南洋	1
一 古代华侨移居南洋	3
二 猪仔华工	6
三 郑和在南洋	12
第一章 胼手胝足，创业他乡	19
一 两位开发加里曼丹的中国人	20
二 新加坡历史上的华侨“先贤”	28
三 叶亚来与吉隆坡的营建	34
四 南洋华侨与橡胶业	40
五 中国移民和南圻开发	44
六 大企业家	51
七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李光前	60
第二章 反侵略，反压迫，与侨居国患难与共	71
一 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血腥大屠杀	72
二 印尼的“红溪惨案”	84
三 泰国的郑王大帝	89
第三章 赤诚之心献祖国	95
一 杰出的归国华侨知识分子	96

二 投资祖国 实业兴邦	108
三 “华侨是革命之母”	115
第四章 晚清时期中国驻新加坡的领事	119
一 晚清的“护侨”政策	121
二 左秉隆和黄遵宪	123
第五章 侨社三宝	127
一 侨团林立	128
二 侨校遍布	133
三 侨报侨刊	136
第六章 印尼的土生华侨	141
一 “伯拉奈干”	142
二 华侨马来语和文学	144
三 新报派	146
第七章 南洋华侨在反法西斯战争中	149
一 “南侨总会”	150
二 回国参战	152
三 “三年零八个月”	156
四 九名中国外交官牺牲	159
尾 篇 历史新页，落地生根	165

开 篇

中国人下南洋

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，从北极圈的阿拉斯加到南美的阿根廷，从欧洲平原到美国的内陆腹地，到处都可以见到华人的踪影。“海水到处，就有华人”，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，它生动地反映了这个现实。海外华人的总人数多达两三千万，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，能熟练地掌握和使用居住国的语言，但许多人还能讲华语（中国的普通话）和中国的一些方言，还保持着中国的传统习俗，并且有众多的亲朋是中国人。有些华人经济实力雄厚，有的在科学教育领域崭露头角。他们的成就，他们的传统美德，博得了世人的赞羨。他们的今天，已广为人们所熟知；相对来说，他们的过去，人们就不那么清楚了。各国华人的祖籍国是中国。他们自己，或者是他们的先辈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，从中国故土启程，循着不同的路线，以不同的方式，年复一年，历尽艰辛，散布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。他们有相同的辛酸血泪、不同的奋斗历程。有一位华人作家这样写道：“……感谢我们的祖先，没有他们当年的刻苦耐劳，就没有今日的繁荣美丽。每一块砖瓦，每一根木头，哪有不沾染祖先的血汗。”^①

南洋，即东南亚地区。这个地区幅员辽阔、人口众多、

^① 苗芒：《坚守》，第10页，新加坡维华文化服务社，1956年10月。

资源丰富、地理条件优越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海上交通必经之地，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上受两国的影响很深。中国和南洋的友好关系与和平交往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古代。伴随这种联系和交往，中国人开始踏上南洋的道路，有些人在那里定居下来。定居在外国的中国公民，就是华侨。不过，“华侨”一词是 19 世纪末才出现的，在中国古书中，华侨被称作“唐人”、“北人”，等等。在历史上，南洋是华侨聚居的地区。这本小书要讲的是南洋华侨的历史和故事。

一 古代华侨移居南洋

中国人是在 7 世纪即唐朝时开始移居南洋的。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鼎盛的朝代，对外贸易、航海事业都很发达。这一时期就有些中国人旅居海外，从事商贸和宗教活动。唐朝的高僧义净，671 年从广州出发去印度研究佛经，归途中，两度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室利佛逝（Sriwijaya）居住，前后共十二三年。有学者认为，他可算是最早的印度尼西亚^①华侨之一。10 世纪时，阿拉伯人马素提在《黄金牧地》一书中，记述了 943 年他经过苏门答腊时，看见许多中国人在该岛上从事种植业。南部的巨港（Palembang）中国人最多，

^① 简称印尼。

他们是在黄巢起义（9 世纪末）失败后避居在这里的。这说明，唐朝末年已有一批华侨因政治原因而在南洋定居。此时，华侨的人数虽然不多，但由于唐朝强大，经济文化影响遍于四邻各国，国际威望很高，因此华侨总豪迈地自称为“唐人”，称祖国为“唐山”，把自己的海外聚居地称为“唐人街”。

华人大批出国，并且在某些国家开始形成华侨社区是在宋朝。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。10 世纪，宋朝建立，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南移，南方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。宋朝的手工业、商业兴盛，海上交通比唐朝更为发达。发展和南洋各国的贸易往来，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。这些，为中国人去南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。当时华侨下南洋，乘的是风帆，要依靠季候风向，有些人错过返航的季风，只好在当地住下来，待次年再北返。后来随着贸易的发展，为便于商品交易，渐渐有中国人居住下来，叫做“住蕃”，而且一住就是 10 年、20 年，娶妻生子。显然，这些“住蕃”，就是早期的华侨。据中国史书记载，中国商人到南洋的爪哇、婆罗洲等地颇受礼遇，他们与当地人民的关系融洽友好。

元明两朝（1271—1644），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都比唐宋时期发达，这样，移居南洋的中国人就更多了。14 世纪时，印度洋的航运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中。明朝初年，在 1405 年至 1433 年间出现了郑和七下“西洋”的壮举。在将近 30 年的时间里，郑和率领着当时举世无双的

船队，访问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其中有 14 个是在南洋。郑和的远航，增进了中国和南洋诸国之间的了解和联系，维护了通往南洋航道的安全，为华侨的出国和他们在南洋的经济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华侨在元明时期已广泛分布到南洋各地。他们开发侨居地，并形成了华侨的“新村”。在爪哇麻喏巴歇（Majapahit）帝国的几处要地都有这样的“新村”，人数相当可观，多的达到 1 000 多户，大部分来自广东、福建南部沿海地区。其他如菲律宾、暹罗、马来亚均有类似的情况。据传说，郑和的船队曾在爪哇中部的北海岸登陆，他的副手王景弘因病重留居一个岩洞中。王景弘及其部下在这里休养、垦殖，使这个地区逐渐繁荣起来，成了一座纪念郑和（“三宝太监”）的城市，叫三宝垄（Semarang）。这传说是否符合历史真实，人们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：爪哇中部的名城三宝垄，最早是中国人开发的。这一时期，有许多华侨与南洋各国的当地居民杂居、通婚，并开始同他们融合起来。

从 16 世纪中叶的明朝中期到 19 世纪鸦片战争前的 300 年间，南洋华侨人数急剧增加，活动的区域更为扩大。这一时期，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，封建剥削和压迫日益加重，闽粤两省的破产农民、手工业者和商人纷纷冒险出洋，寻求活路，久居南洋而不再返回“唐山”的人也多起来了。明清两朝交替之际，政治动乱，也使不少人避居南洋。这是中国人较大批出国的原因。从南洋各国的情况看，16 世纪以后，欧洲殖民主义者开始侵略这一地区，到 19 世纪末，

除暹罗外，整个南洋地区，都成了西方的殖民地。为掠夺东方的财富，西方殖民主义者需要大批廉价而又有较高技能的中国劳动者。因此，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将中国东南沿海的青壮年诱引到南洋去当华工。这样，华侨中除原先的商人、政治避难者外，华工的人数越来越多。到鸦片战争前夕，南洋华侨的人数已接近 100 万，分布更为广泛，出现了更多的华侨聚居区，如巴达维亚（今雅加达）、槟榔屿、新加坡、马尼拉等城市，华侨都在万人以上，他们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在鸦片战争前长达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，中国人不断移居南洋，最后达到了相当的规模，在南洋形成了有浓郁闽粤特色的华侨社会。华侨移居南洋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，但概括起来不外乎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两个方面。商人到南洋经商而定居，破产的农民、手工业者为谋求活路而远走他乡，这些都可看作是经济原因造成的。国内发生政治动乱，为躲避战乱、政治迫害而亡命南洋，成为长期侨居在外的中国人，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。

华侨出国达到高潮，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。

二 猪仔华工

1840 年鸦片战争后的 100 年间，中国人，主要是东南沿海省份的劳动人民，大规模出国谋生，每年平均在 10 万

人以上，累计出国人次超过 1 000 万人，足迹遍及全世界，形成了“海水到处，便有华侨”的格局。

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大量移居国外的原因主要是：第一，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，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自然经济被破坏，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，为寻求生路，不少人漂泊异乡。第二，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东南亚和其他殖民地的资源，加快了对这些地方的开发。特别是 19 世纪后期，随着“自由”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，西方国家开始了向落后国家进行资本输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特别需要来自中国的劳动力。在殖民主义者眼中，中国人不仅是廉价的劳动力，而且是“不持武器而又勤恳的民族”，有较高的劳动技艺，这是矿山开采、园丘种植、公共设施的修筑中不可缺少的。因此，他们大批招诱中国人出国。此外，华侨的大规模出国，和清政府政策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关系。清初承袭明朝的“海禁”政策，将出国视为大逆不道，一律禁绝，如有私出，要治杀头之罪。鸦片战争后，随着《北京条约》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，清政府被迫废除“海禁”政策，使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掠夺劳动力合法化，这也是形成华侨大规模出国的重要原因。

华侨在这一时期移居的地方遍及世界各地，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南洋。有一部分人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到南洋去的，但大部分人是通过“契约华工”的方式出国的。

“契约华工”，是西方殖民者的叫法，是指华侨“自



猪仔华工

愿”通过签订契约，应招到外国去做工。其实华工的“契约”是在暴力、诱逼下签订的，几乎和卖身契差不多。也有把“契约华工”叫“苦力”（coolie）的，它源出于印地语。还有一种更普通的叫法是“猪仔”，说明“契约华工”在殖民主义者眼中与牲畜无异。“契约华工”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出现，但规模小，影响不大。大规模的“契约华工”出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，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才结束。

“契约华工”的买卖（“苦力贸易”、“卖猪仔”）是在“招工”的牌子下进行的。它大致的过程是这样的：

（一）“招工”

南洋各地的种植园主和矿场主将自己所需的华工人数及条件列出，交到设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洋行，由他们代招。洋行再转由专事人口贩卖的“猪仔馆”去操办。“猪仔馆”付款给人口贩子即“猪仔头”，由他们到各处去“招”人。

所谓“招”其实是采取欺骗或掳掠等手段，将壮劳力拉进“猪仔馆”。常见的手段，是用花言巧语诱拐被招募的对象，如说出洋做工可以赚大钱，勾引那些赤贫的人们上钩。为凑足所需人数，在诱拐不成时，不惜采取野蛮的绑架手段，在荒村僻巷、通衢歧路，突然袭击，将人劫走。“猪仔”一进入“猪仔馆”就失去了自由。这种挂着“招工”牌子的“猪仔馆”，在我国东南沿海各口岸均设有，其中以澳门最多。1855年，清末著名学者容闳曾亲眼看见“猪仔馆”的“无数华工以辫发相连，结成一串，牵往囚室”。这种“奴隶牛马之惨状”使他感到鼻酸。在这种暗无天日的“猪仔馆”，囚禁的华工在登轮出洋前，还要受到雇工单位及当地官吏的盘查，供词先由“猪仔头”口授，要说外出做工是出自“自愿”，否则就押回去吊打一顿，直至说出“自愿出洋”而被记录在案为止。“契约”是洋文的，主要内容是出洋做工，完全出于“自愿”，并规定了做工年限、地点、工资等等。猪仔大部分是文盲，自然也认不得洋文，一切只得任人摆布，在“契约”上按上本人指印。契约合同一经签立，领得一点“安家费”后，就“已为砧上之肉，釜中之鱼，欲炙炙之，欲烹烹之”^①。下一步便是苦难的海上航程了。

（二）“浮动地狱”

运载“猪仔”的客船多是几百吨到一千吨的帆船，设

^① 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12页。

备简陋，饮水不足，航速很低。由于贩运“猪仔”十分有利可图，船主为攫取暴利往往超额滥载。“猪仔”登船后即监禁于舱门紧闭的船舱里，形同囚徒。他们被锁在隔成几层的底舱里，非常拥挤，白天只能肩挨着肩屈膝而坐，晚上人靠人躺下。空气混浊，卫生条件恶劣，致使疾病滋生。“猪仔”们稍有不顺，即遭鞭笞。在漫长的旅途中，他们要忍受着肉体上病、饿、渴、闷、打的煎熬和人格的侮辱，死亡率高达20%—30%。在这海上的“浮动地狱”中忍无可忍的“猪仔”们常常被迫奋起反抗。他们杀死可憎的人口贩子、船长和水手。如果反抗失败，就宁可投海自尽而不屈服。“浮动地狱”的幸存者到达目的地后就被送进“新客馆”等待出售。

（三）“苦难岁月”

运到南洋的“猪仔”，主要以新加坡为集散地，那时那里共有六家“新客馆”。馆中设有一排圆木大栅栏，用来禁闭新到的“猪仔”。而且还有武装的秘密会党人物防守，严防“猪仔”逃脱。从这里，“猪仔”陆续被卖往东南亚各地的矿场和胡椒、香料、甘蔗等作物的种植园。在这些地方，“猪仔”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。一名“猪仔”，从招募至运达南洋，盘缠食宿费用只约五六十元，售价却高达二三百元。根据契约合同，每月工资五元，期限三年，工资共180元，但经层层抽剥，“猪仔”本人所得不过几十元而已。如果无其他嗜好，三年约满，可以恢复自由。但是在种植园



挑锡泥的华工

内，往往有烟、酒、赌博引诱，稍有沾染，就需欠债，到时只能继续当“猪仔”以抵债。“猪仔”们还会遇到生命危险。在印尼的勿里洞岛矿区，劳动条件极为艰苦和恶劣。如挑锡泥，华工要踩着狭窄的木板从三四十米深的湖底把锡泥挑上来，每担有百多斤重，劳动强度极大，许多人因体力不支，失去重心而身坠湖底。正像广东客家山歌唱的那样：“挑等（着）锡泥过浮桥，千转（回）过得千转好，一转失脚命会无。”熬过了苦难的“猪仔”生涯，许多人获得了人身自由，虽然心怀家乡，总想攒够了钱，落叶归根，回归祖国，但实际上能实现愿望的人并不多，更多的是终生留在南洋。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在异国他乡辛勤劳动、生息、发展。

契约华工制度从 19 世纪中期起盛行至 20 世纪初期才结束。这是华侨史上血泪斑斑的一页。

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间，累计有上千万的中国人移居

国外，人数多，规模大，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。他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中国迅速半封建、半殖民地化的历史大背景下，作为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流向世界劳动力市场的。离乡背井，移居他方的目的是谋生求温饱。他们是和平的移民，绝不是去征服和掠夺的殖民主义者。他们来自一个有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。他们刻苦坚毅，有很好的生产技术。他们凭着自己的劳动和智慧，在远离家乡的新天地里，谱写出了有血有肉的历史篇章。

三 郑和在南洋

“郑和下西洋”的史事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。郑和（1371—1435），本姓马，小字三保，云南昆明人，是一名穆斯林，同时又是一名佛教徒，明朝初年入宫做太监，称为三保太监。这位笃信伊斯兰教和佛教两种宗教的太监，在明朝永乐三年（1405）至宣德八年（1433）的28年间，先后七次奉命率领强大的船队出使“西洋”。他访问了30多个国家，其中有14国是在南洋。郑和下西洋是当时世界航海史上规模空前的航行，它比哥伦布的航行早半个世纪，规模也大得多。郑和出访的目的，众说纷纭，但主要是两点，即“通西南海道朝贡”，发展互惠的海外贸易关系，以及“宣德化而柔远人”，即同各国建立友好的政治关系。他所担负的是和平的使命，因而所到之处均得到热烈的欢迎，